

## 东风系列导弹问世记

在9月3日的阅兵式上,诸多装备首次亮相,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东风-5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与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这是我们守卫和平的底气,也是东风系列导弹漫长发展历程的辉煌见证。

### “东风”破茧:从仿制到自研

东风导弹的问世离不开1955年回到祖国怀抱的钱学森。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任院长,负责研发导弹。研究院绝大多数成员都是从其他领域抽调而来。

为解决研发问题,聂荣臻与钱学森共赴苏联进行访问。随后苏联提供了两枚R-1导弹给中国,供五院人员拆卸学习。然而,经过研究发现,R-1(射程270公里,弹头约0.8~1吨)的性能实际上与德国的V-2(射程250公里)相差不多,射程和弹量相对有限。因此,钱学森决定直接研发预计射程600公里、弹头1.5吨的R-2(又称P-2)。随后又经过同苏联谈判,开展对R-2的引进与学习。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将国际共运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态势概括为“东风压倒西风”,强调革命力量的必然胜利。1960年10月23日,中国成功仿制出3枚P-2导弹,并在次月试射成功。研发成功

时,大家想起了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而且东风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代表着春天的温暖和希望,因此这些导弹便有了兼具革命意志与文化艺术气息的雅号——东风一号。

随着形势的变化,东风一号已不能满足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必须抓紧研发射程在一千公里以上的东风二号。

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为导弹研制者们筹集粮食物资,举全国之力推进导弹研制。经过四年的努力,完全自主设计的东风二号试验成功。这枚导弹的发动机组件从一号的62件,推进到二号的168件,是中国导弹技术的重要里程碑。

随后在东风二号的基础上又有了改良版——东风二号甲,实现两弹结合。随着罗布泊的蘑菇云升腾,中国向世界宣告,我们不再受任何国家的核威胁与核讹诈,中国人的腰杆子硬了。

### 从独立探索走向现代化

1965年3月11日,钱学森明确提出了“八年四弹”计划,“四弹”即中远程弹道导弹、中

程导弹、中远程弹道导弹、洲际导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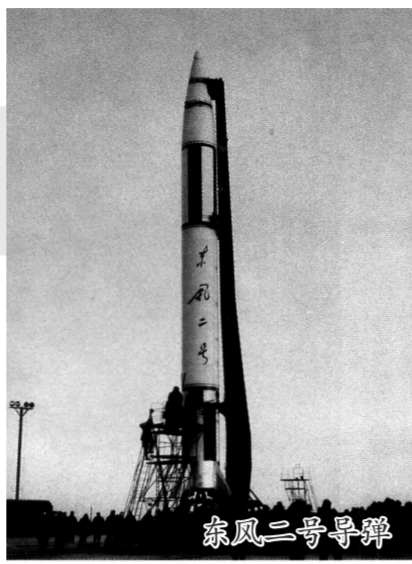
中远程弹道导弹东风二号甲与中程导弹东风三号的研发已经没有太多问题,基本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实现。然而,具有发射卫星功能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东风四号的研发则相对困难。

1970年1月,中国首次成功发射东风四号远程弹道导弹,其射程超过4000公里,标志着中国拥有了覆盖太平洋

大部分地区的战略打击能力。三个月后,东风四号改装的长征-1号运载火箭又搭载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试射成功。

1972年是“八年四弹”规划的时间终点,计划射程8000公里的东风五号虽然立在发射场,却因推进剂舱的泄漏而成为“哑弹”。为了保住研究成果,现场技术人员在几乎没有防毒准备的条件下,冒着红烟硝酸等剧毒侵害风险,舍身抢救这枚导弹。1973年,“东风五号”再次试射,又因主动段仪器舱外压失衡而自毁。

经过科研人员的不解探索,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据《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9.7 魏仕俊/文)



东风二号导弹

1980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向南太平洋试射成功,东风五号也成为国庆35周年阅兵的“重磅嘉宾”。

1984年,中国开始了新一代机动式战略导弹东风-31的研发。然而,大口径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燃烧室铸造技术成了难题。经过中国军工技术人员的不断努力,东风系列导弹的打击精度、突防能力、生存性能等获得全方位的加强。1989年,第一枚东风-31原型弹完成生产;1999年,东风-31试射成功。

从1960年仿制苏联导弹而来的东风一号,到如今亮相的东风-5C、东风-61,中国战略导弹技术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

(据《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9.7 魏仕俊/文)

其中一些囚犯没能活下来,包括艾因特霍芬的父亲。由于营养不良和长途跋涉,身体被拖垮的他死于肺炎,终年51岁。

之后全家被送到东京以西约300公里的一座寺庙,在那里他们处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

艾因特霍芬回忆道,后来他们从“附近也是囚犯的一些意大利人口中”得知裕仁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日本投降的消息。

她仍然记得,在美军一次失败的空投行动后自己和其他孩子一起舔食罐头破碎后留在石头上的汤汁。

艾因特霍芬战后被送回荷兰,之后相继在日内瓦、法国尼斯以及邻近的摩纳哥担任心理学家,她育有两个孩子。但她从未向除家人之外的任何人讲述过那些年的经历。

(摘自《参考消息》8.19)



今年1月13日,蒂内克·艾因特霍芬在家中翻看相册

母会受到惩罚。“我们冒着被处死的风险。”

“我们经历了饥饿、缺水、酷热、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的折磨,还要数小时站在烈日下被一次次地清点人数。”

在1944年1月,艾因特霍芬全家团聚并被遣送到日本。在那里,日本军方希望她的父亲及其团队发明一套雷达系统。

日本战争俘虏研究会的小宫麻由美说,日本境内曾经关押过大量平民的60多个集中营几乎鲜为人知。

## 荷兰幸存者讲述日军集中营苦难

在过了80年之后,蒂内克·艾因特霍芬才能在不至于情绪崩溃的情况下,讲述自己儿时二战期间残暴的日军集中营中所经历的一切。

“现在我可以谈起那段经历而不再泣不成声了。”这位荷兰老人说。她4岁时曾和家人一起被日军关押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一个条件恶劣的集中营里。

她长达三年的梦魇始于1942年初,即日军偷袭珍珠港几个月后。

“在狂轰滥炸之后,日本人来了。”这位现年87岁的心理学家回忆道。这是她首次公开讲述这段痛苦经历。

当时印度尼西亚还是荷兰殖民地,而日本一心想攫取那里的油田和橡胶种植园。

日本人把她的父亲威廉·弗雷德里克·艾因特霍芬与家人分开,他们有一年时间没有他的音讯。

她的父亲是心电图发明

者、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艾因特霍芬的儿子,他当时担任印尼与荷兰的通信渠道马拉巴电台的台长,但他拒绝与日军合作。

他的妻子和孩子则被送往万隆附近的一个集中营,与其他数以千计的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平民关押在一起。二战期间被日军关押的13万盟国平民绝大多数是荷兰人,其中约十分之一死在集中营里。

京都大学历史学家丹尼尔·米尔内说,集中营里荷兰平民人数是战俘人数两倍多的事实,意味着他们的苦难经历在“荷兰的集体记忆中更为真切”。

艾因特霍芬说:“除了一点米饭,我们常常没有其他任何食物。”

她说:“因为我最矮小,我会从围栏下钻出去,到集中营外寻找食物,但我只能找到一些野草。”如果孩子被抓住,父

## 郑和的船队为什么没有绕过好望角

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是亨利王子的追随者,驾驶卡拉维尔帆船,离开里斯本,再次沿着非洲大陆海岸南下,向着那个岬角探险。当船队接近南纬40度到60度之间时,他们见识了“咆哮西风带”的终极拷问。在巨浪“咆哮四十度”、狂风“狂暴五十度”之后,随着船员“尖叫六十度”,所有进入此域的航船皆在劫难逃。

迪亚士遇险在南纬35度,只被西风带扫了一下,他的船队便不知身在何处了。幸运的是,他们未被卷入“咆哮西风带”,而是向南顺风暴漂移,进入了一个避风港湾。

直到发现海岸线,他们才知道自己已经绕过非洲大陆最南端了。狂欢之后,船员们只想把这个惊天动地的发现带回家。为纪念此行探险,迪亚士命名这一最南端的岬角为“风暴角”,他的赞助人若昂二世又将其改名为“好望角”。要到11年后,另一位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船队来到这里,绕过风暴角,进入印度洋,直奔印度,才终于打通了大西洋通往印度洋的航道。

亨利王子播下大航海的种子,终于在达·伽马手上开花。“风暴角”变成“好望角”,才算名副其实了。郑和与亨利王子为同一时期人,应该说,他比迪亚士更早面对了“咆哮西风”的拷问。1417年

他率领舰队第五次下西洋,据说是七次下西洋中探索得最远的一次。船队过红海,沿非洲大陆东岸南下,却未能绕过好望角,奔向大西洋。

郑和为什么没有绕过好望角? 西风湿带,从来都是“西风湿带”的强劲,驯服洋流不得不环绕地球由西向东浪涌,形成西风湿带。迪亚士和达·伽马皆由西向东被西风湿带推着走,虽有风险,却顺风扬帆,逆水行舟,当一支庞大的船队劈面西风湿带之际,郑和怎么办?

除了西风湿带的阻碍,郑和还被一个更为牢固的观念所羁縻,那就是当时流行的“天圆地方”说。据明朝人罗懋登在《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说,当郑和舰队抵达“天方国”时,国王对他讲,我的国家就是西海的尽头,前方再无国土。郑和不信,令舰队继续前行。不料,前哨船果真撞上了陡崖,再往前去,可能就会从大地的边缘掉下去。郑和以为到了“大地的尽头”,便停止了前进。虽然是演义,但演义反映的观念却不会错。相比之下,当时欧洲人正在文艺复兴古希腊,重启“地圆说”,刚好适应了大航海的需要。

最早证明大地圆形并提出“地球”概念的,是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

香港多高楼,无大树。

中环一带,高楼林立,车如流水。楼多在五六十层以上。因为都很高,所以也显不出哪一座特别突出。建筑材料钢筋水泥已经少见了。飞机钢、合金铝、透亮的玻璃、纯黑的大理石。香港马路窄,无林荫树。寸土如金,无隙地可种树也。

这个城市,五光十色,只是缺少必要的、足够的绿。半山有树。山顶有树。只是似乎没有人注意这些树。树被人忽略了。

海洋公园有树,都修剪得很整洁。这里有从世界各地移植来的植物。扶桑花皆如碗大,有深红、浅红,白色的,内地少见。但是游人极少在这些过于鲜明的花木之间留

连。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乘坐“疯狂飞天车”、浪船、“八角鱼”之类的富于刺激性的、使人晕眩的游乐玩意。

我对这些玩意全都不敢领教,只是吮吸着可口可乐,看看年轻人乘坐这些玩意的兴奋紧张的神情,听他们在危险的瞬间发出的惊呼。我老了。我坐在酒店的房间里(我在香港极少逛街,张辛欣说我从北京到香港就是换一个地方坐着),想起北京的大树,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坛的柏树,北海的白皮松。渡海到大屿岛梅窝参加内地和香港作家的交流营,住了两天。这是香港人度假的地方,很安静。海、沙滩、礁石。错错落落,不很高的建

家慎到也认为,天体为球形,并沿着倾斜的极轴转动,但这一观点在中国没有成为主流,我们的主流是“天圆地方”说。思想引导行动,观念决定行程,当郑和在“天圆地方”的思维定式里返航时,西方的后来者则怀着“地圆说”的信念直接大航海了。

郑和落伍了。他的落伍并不表现在大航海的国力上,那时的大明航运体量,即200多艘船只、27000多名船员组成的远洋船队,相比葡萄牙的船队来说无疑是巨无霸级的,但亨利王子比郑和多了几样东西:航海学校、《马可·波罗游记》,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到中国去”。郑和没有这样一个目标,他也不知该往何处去。朱棣没有为他提出新目标,他也就没有新追求,他要解决的,都是些朝廷遗留的老问题,诸如寻建文帝、朝贡贸易,或从战略上制衡西域等。

即使同样来到好望角,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选择仍是不一样的。一个问题的差距,决定了后来数百年的历史。有人说,郑和下西洋,是做赔本生意,赔本生意做一次就够了,哪能一连做7次?一支27000多人的海军,长年累月,游弋海上,需要多少给养?食物和淡水不可能全带来,沿途采办,除了靠支付手段,如瓷器、茶叶等,还要靠制人毕达哥拉斯。

即便到了好望角,他也只能掉头回去,可葡萄牙人达·伽马一拐弯就过来了,此为东西方历史机运的转折点,大明航海时代及其海权思想,随着郑和的逝去而衰落。

15世纪,东西方同步发展,各有其航海时代。郑和受制于西风湿带,大西洋就成了他的隔绝之海,只要回头,他就再也不可能知道大西洋的存在,只能把印度洋当作他的西洋了。他认为自己已经到了西洋的最南端。因此,历史上所说的“郑和下西洋”的“西洋”,原来是印度洋。

在非洲大陆的一个历史岬角,如果给予人类一个双向呼应的文明灵感,郑和绕过了好望角,那将是一个多么生动的东西方对话场景,可惜错过了。(摘自《视野》2025年第17期 李冬君/文)

香港没有大松树,也没有北京的大柏树、白皮松。

“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然而没有乔木,是不成其为故国的。《金瓶梅》中潘金莲有言:“南京的沈万三,北京的大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子。”至少在明朝的时候,北京的大树就有了名了。北京有大树,北京才成其为北京。

回北京,下了飞机,坐在“的士”里,与同车作家谈起香港的速度。司机在前面搭话:“北京将来也会有那样的速度的!”他的话不错,北京也是要高度现代化的,会有高速度的。现代化、高速度以后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呢?想起那些大树,我就觉得安心了。现代化之后的北京,还会是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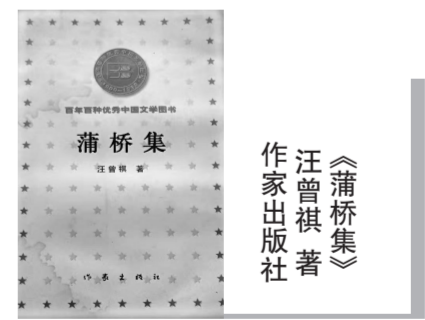
某位同行的内地作家看看大屿山,两次提出疑问:“为什么居住在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的人需要度假。他们需要暂时离开紧张的生活节奏,需要安静,需要清闲。”

某位同行的内地作家看看大屿山,两次提出疑问:“为什么居住在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的人需要度假。他们需要暂时离开紧张的生活节奏,需要安静,需要清闲。”

某位同行的内地作家看看大屿山,两次提出疑问:“为什么居住在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的人需要度假。他们需要暂时离开紧张的生活节奏,需要安静,需要清闲。”

某位同行的内地作家看看大屿山,两次提出疑问:“为什么居住在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的人需要度假。他们需要暂时离开紧张的生活节奏,需要安静,需要清闲。”

某位同行的内地作家看看大屿山,两次提出疑问:“为什么居住在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的人需要度假。他们需要暂时离开紧张的生活节奏,需要安静,需要清闲。”



汪曾祺集  
作家出版社